

薛庆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中国

改革的前奏

Wang Kang
The Chinese

中 国

改革的
意义

中国改革的前奏

薛庆超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改革的前奏/薛庆超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6

ISBN 978-7-215-05940-5

I. 中… II. 薛… III.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史-研究-中国-1975 IV. F129.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5518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66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680毫米×960毫米 1/16 印张 32.75

字数 467千字 印数 1-4000册

2007年6月第1版 2007年6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前 言

1987年10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指出:“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一九七三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一九七五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①

追溯历史,需要从林彪事件的发生说起。1971年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第六个年头。在这一年的9月发生了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的林彪,策划、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企图谋杀毛泽东,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阴谋败露后乘机外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荒漠的严重事件。

“九一三”事件的发生,震惊了整个世界,震惊了全党全国人民,也震惊了毛泽东本人。毛泽东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九一三”事件的发生,进行深刻的反思,并由此开始在一定程度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行局部的纠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页。

正。从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到1973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他受命于危难之际，抱多病之躯，以超人的毅力，为克服“文化大革命”在经济、政治、组织、外交等领域造成的危害，消除由林彪反革命集团所造成的恶果，作了坚忍不拔、坚持不懈、坚决果断的努力，使各方面的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提供了契机。

1973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病重，急需用人之际，毛泽东想到了起用“文武全才，不可多得”的邓小平，周恩来坚决拥护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当代中国的历史由此开始发生重大的转折。

经过毛泽东的决策、周恩来的全力运作，邓小平从流放地江西返回北京，先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十年内乱造成的国内动荡，国际上苏联霸权主义百万大军虎视眈眈，党内有“四人帮”肆意捣乱的严峻政治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把主持中央党政军领导工作的大权、把党和人民的期望、把治国安邦的重任、把中国的前途和希望，放到了邓小平肩上。

邓小平肩负着毛泽东、周恩来和全党全国人民的厚望，在主持中央党政军日常工作以后，以他一贯的干脆果断、雷厉风行、勇于负责的作风和“不怕第二次被打倒”的精神，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进行了无私无畏、奋不顾身的全面整顿：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会议，批评江青，使这个自1966年以来以“文化大革命的旗手”自居、动辄打倒这个打倒那个、“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四人帮”头面人物，大煞了威风。“四人帮”由此转入颓势，全面整顿的契机开始出现。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邓小平以极大的政治智慧，采取了以毛泽东晚年的正确指示去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的高明方法。他把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汇集在一起，加以概括提炼，提出了“三项指示为

纲”。其核心是在实际上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而代之以“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为纲”，即实质上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根据邓小平的决策，全面整顿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地迅猛展开。铁道部部长万里一马当先整顿铁路系统，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创造了全面整顿的先进经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全面整顿科学院，积极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科研政策，受到科技人员和干部职工的齐声称赞。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迎头痛击“四人帮”在国防科研系统的帮派势力，全面整顿国防科委和第七机械工业部，大见成效。教育部部长周荣鑫受命整顿教育界，与“四人帮”在教育系统的帮派势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卓有成效地履行了自己的使命。在全国各个领域，还有大批像万里、胡耀邦、张爱萍、周荣鑫这样的“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脊梁”，顶着“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压力和干扰破坏，全力以赴，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对各个系统、各个方面的全面整顿之中。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支持下，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按照毛泽东关于“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的指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整顿，端正思想路线，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压缩军队编制，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这些重要举措，为一年多以后党和人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在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中，思想理论领域的拨乱反正也得到了高度重视。为此，建立了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有关单位起草了《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等重要文稿，对“四人帮”在思想领域、理论领域、科技领域、工业领域的谬论邪说，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和批判。通过正本清源，激浊扬清，为恢复十年内乱中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但是，历史的发展从来不是直线前进的，而是呈现出螺旋形发展的趋势。在历史前进的长河中，大的曲折、小的曲折，大的漩涡、小的漩涡，大的风浪、小的风浪，总是会经常发生的。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这就引起了靠“文化

大革命”起家发迹的“四人帮”集团的一次又一次的猖狂反扑。他们发动“醉翁之意不在酒”的评《水浒》运动，发表含沙射影的评《水浒》讲话，诬蔑、诽谤、攻击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攻击全面整顿“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并由此掀起“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滔天恶浪，把邓小平打成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然而，中国人民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磨难，早已看清楚“四人帮”的葫芦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色。在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之际，首都人民自发地走上天安门广场，向“四人帮”发起了响遏行云、震天撼地的英勇反击，表达了中国人民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声讨“四人帮”的强烈愿望。四五运动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1976年10月6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党和人民彻底粉碎。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1年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对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于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进行的全面整顿，作了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

“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让我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吧！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九一三”事件引发的深刻反思	1
第二章 中共中央收到的江西来信	18
第三章 陈毅追悼会上出现的重要转机	33
第四章 字字千钧的重要批示	41
第五章 邓小平恢复工作	50
第六章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58
第七章 重新登上国际政治舞台	77
第八章 鲜为人知的重要决策	91
第九章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03
第十章 四次批评江青集团的会议	119
第十一章 “三项指示为纲”	136
第十二章 整顿钢铁工业	146
第十三章 整顿在整个工业领域推开	163
第十四章 各个方面都要整顿	170
第十五章 全面整顿中的浙、滇、闽	180
第十六章 全面整顿在中原	191
第十七章 为贺龙元帅平反	203
第十八章 铁道部部长万里	213
第十九章 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	221

第二十章	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238
第二十一章	教育部部长周荣鑫·····	256
第二十二章	中央军委部署军队整顿·····	261
第二十三章	贯彻落实中央军委扩大会议精神·····	284
第二十四章	建立国务院政治研究室·····	295
第二十五章	工业整顿的重要纲领·····	307
第二十六章	科学院工作的重要指针·····	315
第二十七章	全面阐述“三项指示为纲”·····	326
第二十八章	第一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331
第二十九章	评《水浒》运动·····	336
第三十章	“四人帮”的新反扑·····	347
第三十一章	向“四人帮”的英勇反击·····	364
第三十二章	急剧的逆转·····	375
第三十三章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	382
第三十四章	危难中的民族精英·····	394
第三十五章	千秋功过,历史自有评说·····	409
第三十六章	周恩来辞世·····	417
第三十七章	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	435
第三十八章	邓小平被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441
第三十九章	中国人民的心声·····	452
第四十章	四五运动丰碑永存·····	466
第四十一章	“三株大香花”被诬为“三棵大毒草”·····	481
第四十二章	“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严重危害·····	488
第四十三章	历史的结论·····	499
后 记	·····	511

第一章

“九一三”事件引发的深刻反思

1971年9月13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文化大革命”破坏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正确原则和制度,这就为党内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党夺权活动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和条件。

正是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以林彪为头子的反革命集团得以形成。

林彪,生于1907年,湖北黄冈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伐军中任见习排长、连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随所在部队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以后随部队到湘南,参加湘南起义。部队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营长、红二十八团团长、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参加了红军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长征胜利后,任红军大学校长、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平型关大捷后,为阎锡山军队误伤,先后赴延安、苏联养伤。1942年回国。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被中共中央派到东北工作,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1949年3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中央

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华中军区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在1966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在1969年召开的中共九大上,林彪仍然当选为唯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进一步被党章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黄永胜(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吴法宪(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叶群(林彪的老婆,当时担任林彪办公室主任)、李作鹏(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邱会作(当时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也同时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机构,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进一步加快了篡党夺权步伐。在1970年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为了抢班夺权,打断会议预定的正常议程,大讲“天才问题”和坚持“设国家主席”问题。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也一哄而上,肆意制造混乱,阴谋乱中夺权。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收回刊登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关于吹捧林彪、坚持“天才论”、坚持“设国家主席”发言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尔后,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判了陈伯达的谬论,给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以沉重打击。

1970年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对陈伯达隔离审查。同时,中央责令吴法宪等人,对在会议期间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大闹庐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的所作所为,作出书面检查。在他们的检查书上,毛泽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

在吴法宪的书面检查上,毛泽东批示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光明正大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200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

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泽东在这段批示中,批评了军委“办事组各同志”,批评了“副统帅”林彪。同时,又特意专门点出李德生的名字,说明李德生不在被批评的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之列。这一区别是既耐人寻味又意味深长的。它说明,在毛泽东心目中,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各同志”是不一样的,没有跟着林彪一起犯错误。李德生生于1916年,河南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长征,任师交通队员、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任连长、营长、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及二野旅长、师长。抗美援朝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师长、副军长,曾率部参加著名的上甘岭战役。1954年任十二军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1955年任军长,被授予少将军衔。1958年至1960年在高等军事学院学习。1968年后,任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5月任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毛泽东批示道:“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严厉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个倾向”;“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

但毛泽东仍强调:“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1970年年底,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并大肆宣扬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四个伟大”,表示了明显的反感和明确的反对。他说:“什么‘四个伟大’,讨厌!”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在党内进行了传达、贯彻和学习。在国际上,由埃德加·斯诺撰文发表后,立即传遍了全世界,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这个明显带有对林彪批评和厌恶色彩的谈话,引起了林彪的注意和猜测。他敏锐地预感到自己“接班人”地位的岌岌可危(林彪在叛逃时还带着一份《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纪要》,由

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对于林彪搞的“名曰树别人,实际上树自己”“三忠于”、“四无限”、“早请示”、“晚汇报”、“忠字舞”、“语录歌”等一整套形式主义的东西、宣扬唯心主义“天才论”的东西、宣传唯心史观“个人崇拜”的做法,表示了强烈的反感,多次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要搞这一套。一天,毛泽东还十分愤怒地说:你们把人民大会堂的“语录”统统取下来,不取下来,我再也不进人民大会堂。他指定由李德生具体落实。李德生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与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同志共同办理妥当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部署,以防范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林彪和被林彪控制的军委办事组图谋不轨。1970年12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安徽省党政军主要负责人李德生回安徽布置工作期间,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要他立即回北京,毛泽东要同他谈话的电话通知。他飞回北京后,立即驱车赶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晚年的住地。毛泽东简要地询问了几句安徽的情况后,立即进入主题,直截了当地说:确定你到北京军区当司令员。李德生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十分突然。因为他此时担任着国务院业务组成员、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十二军军长、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员等党政军领导职务,职务和工作都已经够多的了,如果再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担心精力有限,贻误工作。所以,李德生向毛泽东提出:总政的事还管不管?毛泽东非常干脆地说:管,但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北京军区,把屁股坐在北京军区,兼管总政的工作。毛泽东还再一次重申,总政治部主要是搞好“承办批转”,并具体地谈了总政治部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历届总政治部主任的情况。

最后,毛泽东说:你先去参加华北会议,等公布了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命令后,就到职上任。

李德生回到总政治部后,中央办公厅送来了毛泽东主席对周恩来关于开好华北会议请示的批示:

“照办。”

“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建议李德生、纪登奎二同志参加会议。

“永胜、作鹏应同德生、登奎一道参加华北会议。

“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指当时在部队中存在的‘打仗有功’和‘三支两军有功’)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华北会议,集中揭发批判陈伯达。此时,军委召开座谈会,但是开了一个月,既不批判陈伯达,黄、吴、叶、李、邱也不作检讨。于是,中央和毛泽东决定,让参加军委座谈会的100多人全部参加华北会议。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出席华北会议,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总结讲话。然后,宣布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1972年10月为第一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

北京军区即原华北军区,辖北京卫戍区、天津警备区、河北省军区、山西省军区、内蒙古军区和华北地区的所有野战军,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批陈整风深入进行、与林彪集团的决战即将展开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把保卫华北、保卫首都、保卫中共中央、保卫中共领袖的重任,放到了李德生的肩上。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毛泽东的这一选择是完全正确的。李德生没有辜负领袖和人民的高度信任。

华北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多次开会,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进行批评教育,责成他们作出深刻检讨。同时,中央准备在4月份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

1971年3月下旬,按照毛泽东要挽救林彪的精神,周恩来带着李德生和黄、吴、李、邱去北戴河,向林彪汇报批陈整风的情况,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希望他在4月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上讲几句话。但林彪却无动于衷,置若罔闻,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仅仅只对黄、吴、李、邱说,错了要好好检讨,仿佛错误全在黄、吴、李、邱身上,避而不谈自己在庐山会议上打断正常的会议日程,发动突然袭击,坚持“天才论”和“设

国家主席”，妄图篡党夺权的险恶用心。最后，林彪说，他的身体不好。意思是不能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然后就再也不说话了。

周恩来一行迅即返回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北戴河之行的情况。毛泽东听后，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肃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

从毛泽东这段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林彪借口身体不好，拒绝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拒绝检查错误，拒绝从搬给他的台阶上下来，是非常不满意的。

4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会议汇报交流了批陈整风的经验，传达了毛泽东在黄、吴、叶、李、邱书面检讨上的批示，对他们进行了批评帮助，指出他们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会议期间，奉毛泽东的指示，李德生分别找南京军区和浙江省的主要负责人，顺利消除了他们之间存在的隔阂，增强了相互信任和团结。然后，又向毛泽东写了报告。毛泽东阅后批示：“事关大局，出以公心，不应当避嫌。我历来认为，同志之间有隔阂，有问题，应当耐心商量，多做谈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应久拖不决。工作不顺利，有中央帮助，总会解决。”

批陈整风汇报会结束以后，毛泽东鉴于庐山会议结束已经7个多月，林彪却自始至终对于他在庐山会议上的错误不发一言，没有丝毫检查之意，不作任何检讨，多次给他机会让他下台阶，他均置若罔闻，不思悔改，而且在暗中加紧进行阴谋活动，愈走愈远等情况，决定于8月中旬到南方视察。准备通过这次视察，为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彻底解决林彪集团的问题“造舆论”，并向一些曾经受到过林彪蒙蔽和欺骗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打招呼”，使他们明辨是非，站到党的正确原则立场上来。

在毛泽东视察南方期间，对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浙江、上海，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河南省军区、湖北省军区、湖南省军区、江西省军区、浙江省军区、上海警备区及部分驻军

的负责人反复“打招呼”，指出：

庐山这场斗争，林彪集团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称‘天才’”，“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

庐山会议上这场斗争的性质和实质，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毛泽东还多次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要求大家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毛泽东非常坦诚地告诉大家：“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林还是要保。”

毛泽东严肃地警告林彪集团：“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

庐山会议以后，林彪暗中加紧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活动。担任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组织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组织——“联合舰队”，制定了反革命武装政变纲领《“五七一工程”纪要》，召开了由江腾蛟（曾任空四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因在“文化大革命”中反党乱军，受到毛泽东点名批评，指出“此人不可重用”，此时受林彪庇护，在空军政治部工作）、王维国（时任驻上海的空四军政委）、陈励耘（时任驻杭州的空五军政委）、周建平（时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参加的所谓“三国四方会议”（“三国”指上海、杭州、南京，“四方”指江、王、陈、周四个人），对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进行研究和部署。

在毛泽东视察南方期间，林彪集团多次密谋策划，妄图用轰炸机、火焰喷射器、四零火箭筒、炸药等炸毁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暗杀毛泽东于视察南方的途中。毛泽东凭着在长期革命战争和政治风浪中锻炼形成的政治智慧和敏锐洞察力，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从蛛丝马迹中判断出了林彪集团的险恶用心，遂一反常态，改变行程，从杭州急驰北京，化险为夷。